



联合国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成立75周年

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



75

引用格式要求:

粮农组织。2020。《粮农组织成立75周年: 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罗马。

<https://doi.org/10.4060/cb1182zh>

本出版物由粮农组织新闻传播办公室出版物处制作。

作者: André Vornic (引言, 第1-4章)

技术顾问: Karel Callens

研究助理: Daniela De Pascalis

插图: Del Hambre

设计: Fabrizio Puzzilli

本信息产品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 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或发展状况, 或对其国界或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提及具体的公司或厂商产品, 无论是否含有专利, 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或产品得到粮农组织的认可或推荐, 优于未提及的其它类似公司或产品。

ISBN 978-92-5-133419-5

©粮农组织, 2020



保留部分权利。本作品根据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3.0政府间组织许可(CC BY-NC-SA 3.0 IGO;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igo/deed.zh>) 公开。

根据该许可条款, 本作品可被复制、再次传播和改编, 以用于非商业目的, 但必须恰当引用。使用本作品时不应暗示粮农组织认可任何具体的组织、产品或服务。不允许使用粮农组织标识。如对本作品进行改编, 则必须获得相同或等效的知识共享许可。如翻译本作品, 必须包含所要求的引用和下述免责声明: “该译文并非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生成。粮农组织不对本翻译的内容或准确性负责。原[语言]版本应为权威版本。”

除非另有规定, 本许可下产生的争议, 如通过调解无法友好解决, 则按本许可第8条之规定, 通过仲裁解决。适用的调解规则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调解规则(<https://www.wipo.int/amc/zh/mediation/rules>), 任何仲裁将遵循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贸法委)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第三方材料。欲再利用本作品中属于第三方的材料(如表格、图形或图片)的用户, 需自行判断再利用是否需要许可, 并自行向版权持有者申请许可。对任何第三方所有的材料侵权而导致的索赔风险完全由用户承担。

销售、权利和授权。粮农组织信息产品可在粮农组织网站(<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zh/>) 获得, 也可通过 publications-sales@fao.org 购买。商业性使用的申请应递交至 www.fao.org/contact-us/licence-request。关于权利和授权的征询应递交至 copyright@fao.org。

#FA075

粮农组织成立75周年

齐成长、同繁荣、共持续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罗马，2020年



前言 第2页

引言 第4页

1 齐成长 第一个25年
1945—1970 第12页

2 同繁荣 第二个25年
1970—1995 第24页

3 共持续 第三个25年
1995—2020 第38页

4 携手共进 下一个25年
2020—2045 第54页

历任总干事 第68页

部分参考文献 第70页

前言

我历经了漫长的道路，从我的出生地—湖南的稻田乡村，来到毗邻罗马古迹马克西穆斯竞技场的粮农组织。多年以来，粮农组织一直是粮食和农业—人类文明两大根本要素的最高国际权威机构。每一天，我都为能领导这个组织而备感荣幸，同时又心怀谦卑。

下面的内容以清晰易懂的方式记录了粮农组织的发展历程，并以此庆祝其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简明概括了激励着我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原则，同时也展望了未来要走的路。

回顾我执掌粮农组织的这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诸多改变。即便在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危机之前，我就说过问题也是进步之源，困难能够催生切实的创造力，这在相对顺风顺水的时期是不容易获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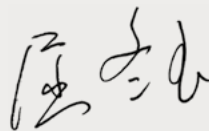
当前疫情引发的社会变革可能是很多人有生之年见到的最大变化。但我们也应认识到，这同样促进了社会的快速调整，包括国际组织的运作方式。像粮农组织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知识共享文化和组织程序的机构，已被证实是能够在短时间内拥抱创新并大举将工作移至线上的。创新一方面意味着数字化（本出版物列举了一些我们大力推动数字化的举措），另一方面也表明需要改变整个机构的运作模式。第一步就在于改变思维模式。

我们正着手精简粮农组织的管理架构，从各自为政转向团队领导。透明度会带来好处：向世界开放，世界也会为你开放。减少官僚主义和扩大自主决策不仅有助于释放才能，也是让粮农组织表现卓越、发挥号召力的先决条件。

我们必须既是畅想家，也是行动派，将思考与行动融为一体。因为粮农组织的价值体现在为成员国提供解决方案，助其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所有人的生计。如今我们能够为各国政府提供一系列的建议，比如：准确说明哪些政策可以大幅降低健康膳食的成本，从而改善30亿人的生活，节省每年在健康和环境方面支出的数万亿美元经费；或者通过“手拉手”行动计划明确哪些国家可以开展结对合作，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未来几年内，我们将进一步在整个组织层面落实调整。与此同时，我希望您能享受本出版物为您带来的历史之旅，从中了解粮农组织的发展历程和前进方向。

衷心感谢您为实现一个没有贫穷和饥饿的世界所付出的努力！



粮农组织总干事
屈冬玉

引言

从恐惧中萌生希望，从废墟中产生愿景，无数的人们从战乱中重新振作起来，卷起衣袖努力奋斗。

这一年是1945年，战争已经结束，在思想和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掀起了一股复兴的风潮：经济和国家治理、科学和社会研究、工业工程、人文艺术等方面都开始重振旗鼓；在价值和未来的期望方面也是如此。

人类的最新信条是维持和平的承诺，以及万事皆有可能的信念。尽管世界因冷战再度分裂，殖民地的紧张局势也在暗中酝酿，然而新的国际主义已然生根发芽，随之而来的是各国都下定决心，要永久性地结束人类自有史以来便深受其害的一些痼疾。

其中最主要的两大难题便是贫穷和饥饿。



极度饥饿人口 遍布全世界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规模杀戮相比，鲜为人知的是，粮食短缺造成了大量死亡。在战乱导致的6000万死亡人口中，估计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死于营养不良及与之相关的疾病。1943年在孟加拉，约有300万人死于饥荒。在当时还属于苏联的乌克兰，战争尚未开始前饥饿就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中国也有数百万人饿死。在西欧一些比较富裕的国家，战争对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在荷兰，1944-1945年的冬天，人们只能靠吃郁金香球茎活命；在战后初期的比利时，80%的儿童都患有佝偻病。

农业遭到大范围重创，全球各地的粮食生产都出现了萎缩：在欧洲、苏联的加盟国和北非，粮食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一，东亚则减产了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增长了10%，致使人均农业产量整体上比战前下降15%。据人口统计学家预计，人口数量还会出现激增，这使问题变得更为糟糕。到1955年，拉丁美洲的人口预计将重新恢复至战前人口的一半。

随着二战的结束，各国下定决心要永久性地结束贫穷和饥饿两大痼疾。





1948, 希腊

一项粮农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项目在希腊为小学生提供早餐。
©联合国照片/粮农组织



1945, 加拿大

粮农组织于1945年10月16日在成立，34个国家在加拿大魁北克市签署了《章程》。不久后，更多国家陆续签署。
©粮农组织

粮农组织的诞生：由美国人播种，在罗马获得新生

即便世界上很多国家还在艰难地解决温饱问题，一些大胆创新的词汇正在勾画出新视野。早在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在他的一场演说中，将免于匮乏的自由列入他所提出的“四大自由”，对联合国基本原则产生了激励作用。他将这种自由定义为“经济方面的理解，将确保世界各国的人民在和平时代过上健康的生活”。

在一片萧条景象中，北美洲脱颖而出。美国本土在战争中躲过了直接冲突，农业生产得以继续增长，从1929年和20世纪30年代初的危机中恢复过来。推动粮食及农业组织创立的许多早期智力投入都是来自美国。

二战的结束提供了推动力。不过，成立一个以推广农业专门知识和改善全世界农民命运为宗旨的组织（即后来的粮农组织）这一理念诞生于战争之前。早在1905年，一位富有远见的美国人——大卫·鲁宾便播下了成立这一机构的种子。他的倡议虽在自己的祖国遭受冷落，对意大利王室却很有说服力。



大卫·鲁宾
(1849-1919)

鲁宾是一位在波兰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生活的农学家，他一生孜孜不倦地为农业和农业从业者奔波呼吁，组织活动。作为一个企业家、思想家和活动家，他深信只有成立一个国际组织才能成功地捍卫农民的利益，改变他们受价格波动、社会地位

低下和没有政治谈判能力等因素限制的被动局面。

鲁宾的提议相继在美国、法国和英国遭到断然拒绝，却最终获得了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的青睐。1905年6月7日，意大利政府召开了总部位于罗马的国际农业研究所的第一届会议。该研究所的宗旨是帮助农民共享知识，建立一个农村信用社系统，并在贸易中能对自己的农产品具有掌控力。46个国家派代表出席了第一届会议。该研究所于1945年停止运作，由粮农组织取而代之，接过了在农业方面进行国际协调的任务。

新的组织用“大卫·鲁宾”来命名其图书馆，以示纪念，并继续收藏鲁宾的个人档案库，包括他的随笔和论著。

1945年10月粮农组织成立，旨在推广农业知识和促进营养健康。

1945年10月1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市标志性的芳堤娜城堡举行的会议上，34个国家政府的代表签署了一个粮食及农业领域常设组织的《章程》。两周后，首次粮农组织会议即将闭幕时，成员国增加到42个。特别之处在于，粮农组织的成立时间比联合国还要早8天（因为《联合国宪章》于6月在美国旧金山签署，但尚未达到批准的门槛）。粮农组织的《章程》规定其为一个协作性的组织，具有广泛的职责，旨在推广农业知识和促进营养健康。第一任总干事为来自苏格兰的约翰·博伊德·奥尔。

《粮农组织章程》序言 (节选)

接受本章程的国家为了下述目的：

- 提高它们各自管辖下的人民的营养水平和生活标准；
- 确保提高所有粮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效率；
- 改善农村人口的状况；
- 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并保证人类免于饥饿；

决心加强它们分别的和集体的行动以提高共同福利，特此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各成员将通过本组织彼此报告在上述行动范围内所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

1951, 意大利

位于意大利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部大楼即将完工。
©粮农组织



为认可意大利在推动与粮食相关的国际合作方面的开拓性努力，粮农组织的总部由最初的华盛顿特区迁至国际农业研究所所在地罗马，入驻一幢改造后的大楼，该楼原定用途是作为殖民时期的意属非洲部的办公地。粮农组织总部大楼位于

两大名胜古迹—卡拉卡拉浴场和马克西穆斯竞技场的中间，其建筑设计遵循理性主义原则，并扩展了战后国际风格的元素，如今约有3000人在此办公在联合国各机构总部大楼中，粮农组织大楼是建筑风格最为突出的一幢。



齐成长

齐成长

第一个25年

1945-1970

粮农组织成立初期的一个主要重点是提高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率，以及消除各种阻碍增长的因素，以应对世界人口快速扩张和饥饿危机下的最为迫切的需求。因此，早期制定的方案大都与最大限度提高农业产量有关。粮农组织还促进了国际磋商和合作等更广泛的措施，众多国家在这些措施的激励下、并在听从粮农组织的建议后，都纷纷制定了农业发展计划。





1966,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Hacienda Pesillo
麦田里的农民。

©粮农组织/S. Larrain

粮农组织的里程碑

[1945-1970]

1946

粮农组织举行了粮食紧急问题特别会议，会议不仅解决了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也为处理粮食生产方面的历史问题提出一系列提案，包括定期开展世界普查，提高土壤肥力，植物病虫害防治，以及通过粮食救济应对紧急情况。

1946

世界粮食调查。这份调查涉及70多个国家，证实了人们长期以来的认识：饥饿和营养不良在世界各地肆虐。尽管相对于今天的标准而言，此次调查并非准确，但却是为分析世界粮食状况作出的一次开创性的努力。

1947

粮农组织的首份年度旗舰出版物《粮食及农业状况》面世。该出版物对粮食及农业的主要方面进行基于科学的评估，面向广泛的读者群。1948年，粮农组织开展了首次全球森林资源评估，该评估现在仍然每五年开展一次。

1950

世界农业普查。该普查汇集了81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全面描绘了二战结束五年后的农业概况。相较于战前普查，这次普查要精确得多，首次重视了方法学和数据可比性。



必要的农业扩张缺乏私人资本，获得技术的渠道又十分有限，这就要求建立广泛的公共融资机制，特别是在欠发达国家。尽管大部分投资都来自国内，但在一些急需领域，比如购买进口设备方面，来自国际和外国资金至关重要。

信贷大幅增长，即便是在贷款利率过高导致许多小农无法企及的国家也是如此（战争结束的10年后，印度农业贷款的90%仍由放高利贷者提供，利率一般都很

1951, 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当地工人在修建一条70公里的运河。这是政府实施的一项用于灌溉6000公顷土地的项目，并得到了粮农组织专家的支持。

©粮农组织/E. SCHWAB



高)。到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在南亚和东亚，一系列立法改革将土地所有权转让给种植者，并鼓励合并零散的所有权，从而消除了土地有效利用的体制障碍。在实行所有权证正式登记方面也获得了巨大进步，许多国家还规范了农业税收制度。

在后来被称为发展中世界的一些国家，水的利用和控制得到了改善，在这方面取得的进步最为显著的是墨西哥、泰国、新独立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许多

其他国家水资源进行了第一轮系统性的调查。灌溉系统也开始投入应用。

在苏联和中国，农业集体化或已完成，或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也在水资源管理和农业的其他方面报告了进展。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和冷战已将二战刚结束时形成的合作精神消磨殆尽。在此过程中，敌对势力之间的信息交流逐渐减少。同时，较贫穷的国家在报告方面综合能力不足。

1951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议，粮农组织应持续监测全球饥饿状况，并报告任何“可能迫近的严重粮食短缺或饥荒”。这为粮农组织增加了一项职责，即开展实地调查，并召集各国政府举行会议，以“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针”。这项建议还激励粮农组织研究建立粮食储备的可行性，以应对战争、自然灾害或虫害导致的严重粮食短缺或饥荒。

1952

根据在印度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的请求，有害生物防治的一个里程碑事件—沙漠蝗虫防治计划于1952年正式启动。10年后，该计划因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而得到了极大加强。在过去数十年里，粮农组织的蝗虫防控战略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在发现蝗群暴发后最大程度地降低损失，转向在蝗群形成之前就消灭蝗虫。尽管该计划被广泛认为是成功的，但蝗虫防控在今天仍然至关重要。在2020年，粮农组织又一次帮助东非抗击极具破坏性的蝗灾。

1955

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到访粮农组织，呼吁为“免于饥饿运动”提供支持。经过多年的磋商，粮农组织于1960年正式发起了这项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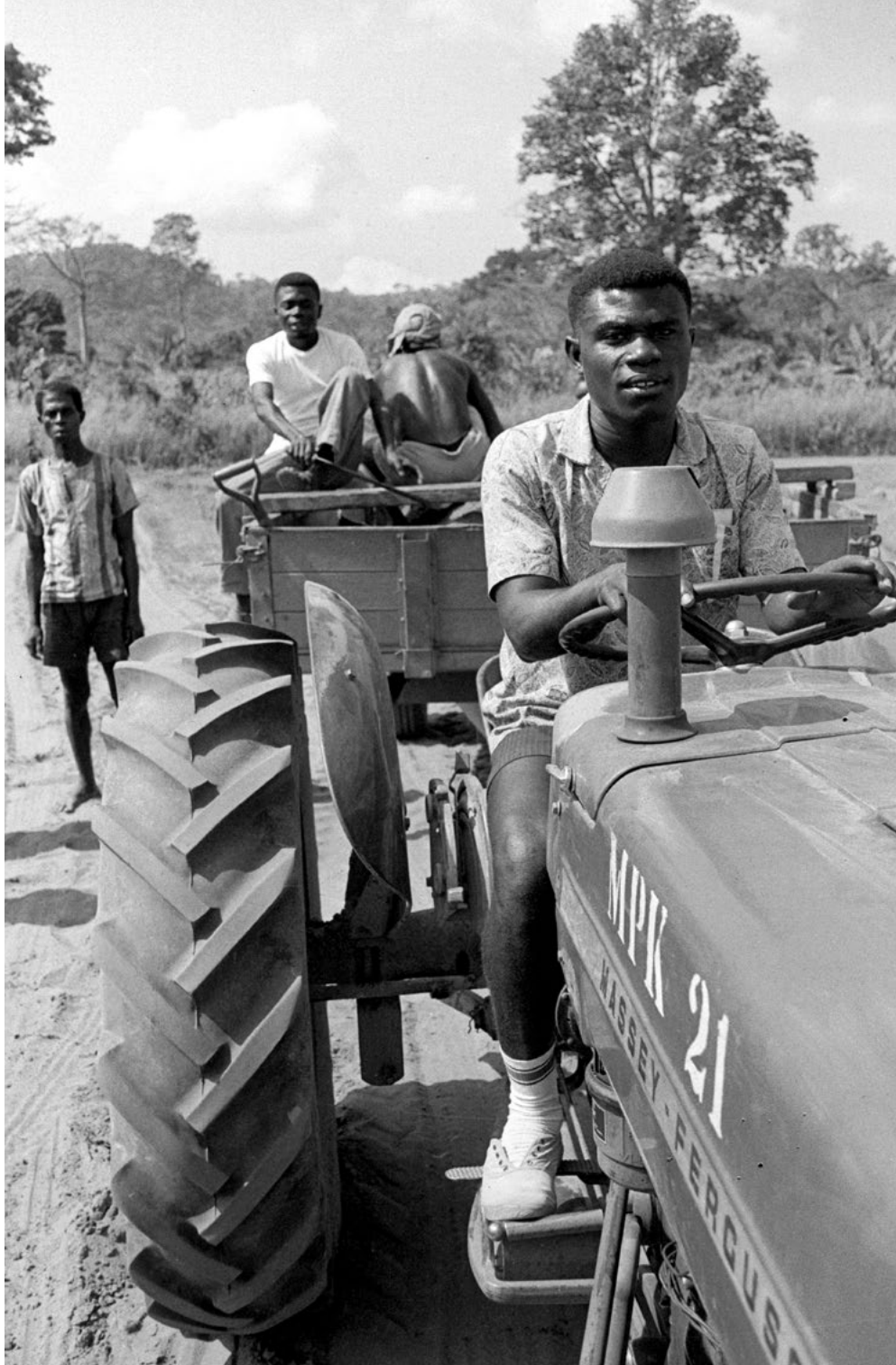
粮农组织的早期项目旨在最大限度提高农业产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世界人口需求。

1969. 加纳

加纳Akesombo的伏尔塔河大坝建成后，工人在两个新移民村之间进行道路建设。

©粮食署/粮农组织/
Peyton Johnson

尽管存在数据缺口，但有证据表明全球大部分地区在农业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机械普及率出现了巨大飞跃。登记的拖拉机数量增长了三倍，从而释放了大量原来用于种植役畜饲料的土地，用于种植粮食。



植物育种也经历了充分发展。在一些欧洲国家，杂交玉米使单产得到大幅增长。发展中国家使用了新型合成农药和选择性除草剂后，基本作物的生产率也得到迅速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亚洲各国都普遍使用改良的高产水稻品种和新品系。整个亚洲大陆从绿色革命中获得了最丰厚的回报，在近30年内，高产水稻品种在所有作物中的占比提高到三分之二，近90%的麦田种上了现代小麦品种。



1960, 突尼斯

一名粮农组织专家采用从耕地中滤出盐的方法，在突尼斯进行水稻种植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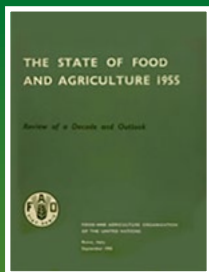
©粮农组织

1957 ○ 粮农组织发起了“世界种子运动”，涉及79个国家。该运动建立了报告机制，以增加优质种子的采用率，以此来提高生产率。

1958 ○ 设立了一个特别基金，以扩大联合国技术援助计划的范围。基金集中用于一些大型项目，如评估和开发下列行业中的人力资源：手工业和家庭农业、林业、运输和通讯、建筑和住房、卫生、教育、统计和公共行政。粮农组织负责执行了特别基金下的许多项目，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主要国际技术援助机构的地位。

1961 ○ 粮农组织与联合国负责文化的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共同制定了世界土壤地图。这项意义非凡的研究历时十五载，所绘土壤地图采用了一万多张现有地图中的信息。该项目的导言道明了其挑战之巨和工作范围之广：“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土壤资源的定性和定量评估，征求了大量土壤科学家的意见，这项工作自本世纪初便开始了。根据主要土壤类别对土地储备进行了估算，但从不同来源收集的数据差异很大。”命名和分类上的差异加剧了难度。（粮农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在此后的数十年里又多次携手合作，合作项目包括促进可持续美食烹调，以及向南苏丹的牧民提供生计方面的教育。）

粮农组织《1955年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前言 (节选)



在这十年（1945 - 1955）中，农业、林业和渔业采取的技术方法比以往任何十年期都获得了更为迅速和广泛的进步，农业的社会经济方法也获得了显著改善，还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许多国家开始进行农业发展和森林政策方面的统筹规划与安排，各国采取了大量措施试图限制农产品价格波动，并给予种植者从未享受过的经济保障。营养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特别是确保儿童和母亲的最低营养水平方面的成果。国际投资和技术援助方案得到落实，这些方案的主要宗旨是解决欠发达国家的生产率低下、营养不良和农村贫困等根深蒂固的问题。以上仅列举了过去十年里所取得卓越进展的一小部分。

20世纪50年代以来，畜牧业得益于更系统化的畜群登记和人工授精的广泛使用。较贫穷的国家设立了国家兽医服务机构，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在每公顷每头动物单产方面取得了巨幅增长。

总体而言，在粮农组织成立后的10年里，全球粮食产量比二战结束后增加了四分之一，在人均方面也有所增长。

绿色革命中，改良品种在新的广大地区得到了种植。机械的使用增长了三倍。20世纪60年代初，现代人道主义发展到对粮食危机作出响应。



1969, 阿富汗

一名粮农组织喀拉库尔绵羊专家在阿富汗为喀拉库尔羔羊拍摄照片，作为选育过程的一部分。学生在一旁观看。
©粮农组织

即便如此，所取得的进步也远远不均衡、不充分，而且也并非不会发生逆转。总体上，尽管农业获得了切实增长，但与工业领域的增长幅度相比显得相形见绌，而工业增长是西方国家战后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

并没有很好地利用绿色革命的机遇，而是受制于一系列问题：资本短缺、土地所有权不规范、农业投入仍处于初级水平、获得信贷和技术的渠道有限。在此后的数十年里，该区域一直是国际发展努力的重点。

1961

肥料计划。粮农组织肥料计划在“免于饥饿运动”的大背景下发起，旨在通过有效利用肥料来提高作物生产和农民收入。该计划很快将范围扩大到囊括作物高效生产的所有方面，如改良品种、改进土壤管理和杂草防治，以及进行更有效的植物保护。总体而言，在20世纪60年代，肥料的使用每年增加14%。

1961

世界粮食计划署成立，作为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的粮食援助附属机构，当时是一个试验性的计划，两年后才获得完全永久地位。粮食署成立几个月后便对伊朗破坏性极强的地震作出响应，其应对措施构成了最早的持续紧急干预模式。

1963

成立食品法典委员会。食典委由粮农组织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设立，动态汇集了统一的国际食品标准、准则和行为规范，涵盖兽药、农药、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等类目，其宗旨是保护消费者健康，消除贸易壁垒，为价值2万亿美元的食品行业的争端解决提供参考。

1970, 伊朗

修复和翻新在1962年伊朗地震中严重损坏的旧灌溉水坝。村民要求政府和粮农组织提供财政援助和技术咨询。

©粮农组织J. Krosschell



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增长，在粮农组织历史上第一个25年的末尾，饥饿仍然在持续。

在粮农组织成立后的最初25年里，农业供应链脆弱不堪，在确保人们普遍获得食物方面也存在长期难以攻克的难题（即便对那些大大得益于绿色革命的国家而言也是如此），而这些困难很大程度上也与各种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造成的突发性灾难不无关系。

1962年9月1日在伊朗北部布因扎赫拉地区发生的强烈地震导致1.2万人死亡。这次事件从人类角度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而对新成立的人道主义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来说则是一次压力测试。这个由联合国和粮农组织共同成立还不到一年的机构在地震发生后，迅速筹集了1500吨小麦、270吨糖和27吨茶

叶。此后数十年间，粮食署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组织，为世界半数国家提供粮食援助。

在1945至1970年间，农业生产一直在不间断地增长。然而，人们也意识到，尽管粮食增加对预防饥饿至关重要，但即便有充足的粮食，单此一项也不足以消除饥饿。实际上，在此期间，消除饥饿一直可望而不可及。换言之，罗斯福总统的第四个自由一直处于“穿越群山”之后才能看到的不断变化的地方，而通往目的地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开阔的，往往还会遇到冲突、不公平和忽视等障碍。

1966 世界土地改革大会。大会由粮农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共同举办，是在解决造成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结构性问题方面做出的首次重大尝试。大会为此后数十年不断探索更综合的办法定下了基调，而不是仅满足于追求更高的农业产量和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大会收集了世界各地有关土地改革的举措，以期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

1969 粮农组织林业部成立。

1970 第二届世界粮食大会在海牙举行，旨在呼吁人们关注世界各地的饥饿和营养不良问题。大会根据粮农组织的战略，确定了需要立即采取行动的五个领域：促进基本粮食作物高产品种的广泛使用；减少废弃物；填补蛋白质缺口；改善农村生活质量并增加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蓄。





同 每 繁 榮

同 繁 荣

第二个25年

1970-1995

从数量的角度来看，粮农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二大篇章是以相对高调的姿态开启的。据1970年的《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记载，自1948年以来，粮食总产量增加了70%，年增长率为2.7%，比较可观。在渔业部门，增长速度更快，为4.4%，十分亮眼。大体而言，粮食产量增长与人口增长的速度相当。

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事态发展良好，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信号。一方面，饥饿继续造成大量死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粮食生产年均增长率只有0.6%，而且即便有收益，也无法维持。



粮农组织的里程碑

[1970-1995]

1972

萨赫勒危机。粮农组织和粮食署警觉地注意到萨赫勒地区因干旱导致的紧急情况，收成损失惨重，牲畜大批死去。救济行动立即进行动员。第二年年初，粮农组织派往马里、尼日尔和上沃尔特（现布基纳法索）的代表团汇报了当地的进一步需求情况。随后，该地区收到了150万吨谷物、7万吨健康食品，以及大量种子、农药、救援物资和现金援助。到1975年，危机消退。

1972

由粮农组织协办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提出了100多项建议，粮农组织执行了其中的四分之一，涉及农业保护、渔业和其他自然资源。

1978, 中国

女孩从果园里采了一篮梨。
©粮农组织/Franco Mattioli



1970, 圭亚那

新品种高产水稻在圭亚那
种植。

©粮农组织/J. Ciganovic

《1970年粮食及农业状况》报告

(节选)

本报告的这部分总结章节进一步证明，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争取粮食生产充分快速增长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采用谷物高产品种后取得的一个主要成果是，重又获得了更高层次的粮食自给自足，其中部分国家甚至已经出现、或者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产能过剩。

1972年，粮食生产自战后以来首次出现下跌，获得的剩余全部耗尽。与此同时，石油危机重创西方经济，导致近30年来不间断的经济扩张惨淡落幕。

除经济冲击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工业国家，自60年代末开始累积的社会矛盾逐渐明朗化，乐观主义逐渐消失，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周期已经结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和去殖民化后的这段时间，还没能实现人民生计的大幅改观；经济领域的赋权落后于政治领域。到这个十年期结束时，坦桑尼亚领导人朱利叶斯·尼雷尔在一次世界农业改革大会上还谈到，人们继续遭受“难以置信的痛苦和肮脏”。



1974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粮安委）应同年举行的世界粮食大会上所提出的建议而设立。粮安委的宗旨是协调在消除饥饿和改善营养方面的各方努力。其早期工作重点仍是提高粮食生产和维持价格稳定，后经重组，变得更具参与性，并能应对各种危机和结构性挑战。

1976 粮农组织技术合作计划启动，旨在支持成员国的发展努力，为粮农组织职责范围内的所有领域提供援助。

1977 为应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危机，粮农组织的全球粮食和农业信息及预警系统加强了监测，并每月提供报告。至今，该系统仍继续监测粮食供应和需求状况，并对各国可能发生的粮食危机提供预警。

《寂静的春天》， 雷切尔·卡森 著（节选）

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认为我们可以对虫媒病置之不理。但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是：采用饮鸩止渴的手段来解决问题是不是既不明智，又不负责任？世界听惯了一边倒的喜报，以为只要控制了病媒昆虫就能战胜疾病，但另外一些消息却淹没在颂扬的喧嚣当中——那些防控失败的例子、那些昙花一现的成功。这些负面消息让我们逐渐明白，正是人类一直以来的行为才让害虫大军越发猖獗，而更糟的是，我们一直在斗争中自毁长城。

随着经济受到冲击和增长停滞，环境方面的关切受到人们的关注。

随着取得线性进展的希望落空，既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遭到质疑。在尽管富裕但经济暴跌的西方，环保意识正在萌生。对环境问题较为敏感的人士首先在社会和文化层面、继而在政治上发出越来越强烈的呼声。早在1962年，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便详细描述了大肆使用农药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破坏。该书呼吁开展环保行动（这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为美国1972年颁布滴滴涕禁令奠定了基础，并将继续对美国的舆论和公共政策带来深远的影响。



1980, 埃塞俄比亚

在埃塞俄比亚，农民在退化的土地上挖等高土堤作为控制土壤侵蚀的措施，并种植树木和灌木使土地再生。
©粮农组织/Florita Botts

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在1972年于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我们确实不希望环境再遭到破坏”，她指出了当时在意识形态上的两难之处和政策方面的取舍，并接着说，“但同时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正处于贫困之中。最大的污染源难道不正是贫困和生存需要吗？”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保护环境的关切改变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从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社会各界和政策制定者更加敏锐地意识到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人们开始寻找对自然破坏程度较小的方式来实现可取的社会目标，比如消除饥饿。

1979 ○ 世界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会议在罗马举行，会议通过了“农民宪章”，以促进土地获取，从而进一步解决导致粮食不安全的结构性问题。

1981 ○ 150个国家共同庆祝首个“世界粮食日”。“世界粮食日”定于每年10月16日，以纪念粮农组织的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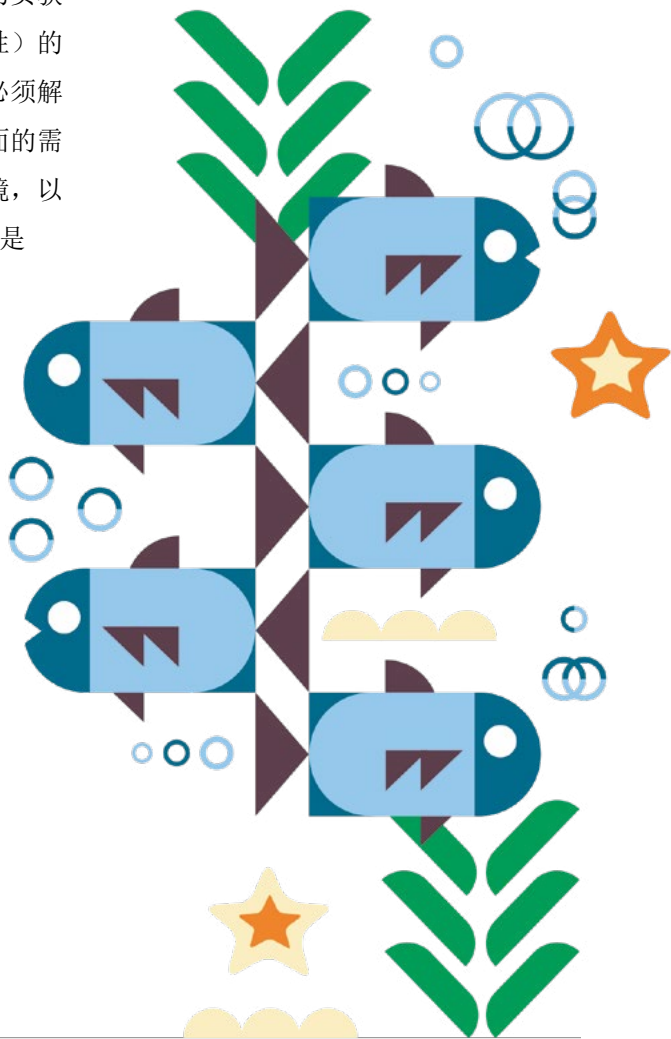
1982 ○ 国际种子信息系统。该系统在微型计算机中运行，包括商业种子库和林业研究计划的技术和管理做法。

1983 ○ 森林资源信息系统作为热带森林电子数据库，正式投入运行。

许多人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海洋：海洋是亿万民众的重要营养来源，对许多其他人来说，海洋等同于生计。海洋还支撑着广大渔业部门，以及整个沿海和岛屿经济。大约在70年代中期，由于专属捕鱼区的争端加剧，对鱼群的担忧不绝于耳，鱼类产量开始趋平。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在1984年出席粮农组织活动中就这一问题发表了意见，谈到需要确保“不对海洋资源进行自私短视的掠夺式开采”。1995年，全面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问世。水产养殖业得到了推动。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方面，粮农组织成立以来的第二个25年是一段观点转换快速但行动转变迟缓的时期。主流的农业发展方针仍然追求数量和产量增长。但不管怎样，消除饥饿的竞赛不再脱离现实语境，开始逐步体现出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关切。

荒漠化、干旱、粮食危机和饥荒导致饥饿具有循环性和系统性。粮农组织及兄弟机构开始在其话语中传递确保切实获得食物（而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获得性）的信息。为改善食物的获取途径，还必须解决一系列其他与人相关的和社会层面的需求，即教育、健康、清洁安全的环境，以及和平。这些并非仅仅是需求，而是开始被强有力地表达成权利。在寻求消除饥饿的过程中，不平等被视为在道德方面不可接受和政策方面的障碍。





1984, 菲律宾

在菲律宾三宝颜，传统渔船向Baliwasan海边的栈桥靠近。
©粮农组织/Marie-Christine Comte

1984

世界渔业管理和发展会议在罗马召开，商定了渔业管理方面的长期目标。会议还讨论了渔场准入的问题，并记录了在通过新海事法律方面的进展。（此前的一份有关扩大国家沿海管辖权的协议未能解决领土分配制度，包括使用权。）

1985

第五次世界粮食调查指出饥饿人口不断增长，并推动采取粮食补贴和营养教育等干预措施。此前一年，为应对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富裕国家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公共筹集活动，主要通过慈善大联盟“Band Aid”进行。

1986

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当时称为“农业统计数据库”）启用。该数据库是粮农组织年鉴的电子版，也是最全面的农业信息和统计资料来源，免费提供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自1961年起收集的统计数据。

对“多”的追求逐渐转变成对“好”的追求；促进“成长”转变成重在“繁荣”。

在此过程中，粮农组织从一个技术合作组织部分转变为国际发展机构。这种演变源于一种理解，即对粮农组织职责的狭隘的、基于量化思维的解读已经站不住脚了。对“多”的追求逐渐转变成对“好”的追求；促进“成长”转变成重在“繁荣”。例如，对集中灌溉计划的技术支持不如地方性的、以社区为中心的计划受欢迎，因为这些计划不那么浪费资源，能更快速地建立和发挥作用，并且更有可能增强韧性。



1987, 中非共和国

给生病的小牛喂送口服药物。这是中非共和国政府旨在加强和巩固畜牧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和活动的一部分。
©粮农组织/R. Faidutti



随着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在70年代中期获得正式认可，“粮食安全”这一新概念整合了可得性和获取的原则。粮安委是一个联合国机构，其秘书处设在粮农组织，是一个包容性的论坛，至今仍是政府官员、专家、民间社会和业界讨论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和寻求改善营养方法的重要平台。

随着80年代末的结束，柏林墙倒塌后释放的合作精神触发了人们对可实现目标的重新认识。欧洲单一市场和世界

贸易组织相继诞生，自由化风潮席卷世界，许多商业壁垒瓦解。然而，日趋全球化的交流转变成日趋全球化的食品安全关切。英国牛群暴发了牛海绵状脑病（即“疯牛”病），与食用者罹患克雅氏病（一种退行性神经疾病）有关。这一事件使人们不无忧虑地联想到人类健康与动物卫生之间的关联。食典委在借鉴粮农组织抗击牲畜疾病的专门知识基础上，应对动物饲料的棘手问题，这是确保人人获得安全、充足、营养的食物的努力中较为复杂的部分。

1987

食品放射性污染应对措施。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爆发，放射性尘埃扩散至欧洲和亚洲，造成消费者的恐慌，并对食品流通造成破坏性影响，一年后，针对可能遭受放射性核素意外污染的食品，粮农组织提出了若干关于控制此类食品贸易的建议措施。

1988

非洲实时环境监测信息系统在粮农组织总部安装，以收集有关降雨量和植被的卫星图片数据。

1991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由粮农组织大会最初于1951年通过）经过修订，内容得以加强。（该公约后在1997年又经过一轮修订，正式成为制定植物健康标准的组织。）



在90年代中期，粮农组织无疑发展成为一个更专业、更先进的机构，拥有广泛的知识 and 精湛的统计技术。但在一个快速放松管制的时代，粮农组织也展现为一个庄严的规范性机构，它的机构文化是以政府为导向的，即便在农业倡议和标准制定权已基本转移到私营部门时也是如此。各国政府本身，特别是转型期的国家政府，也越来越希望从智库和独立基金会获得政策建议。在危机接连不断的时期，在

公共和政治领域快速筹集各种资源的能力更是全球性非政府组织的强项。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粮农组织对战后的农业和社区做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推动了增长和营养两方面取得发展，可以认为粮农组织自身也经历了类似的改变，即先快速扩展，然后进行复杂的微调。在接下来的25年中，气候变化、持久冲突和饥饿率呈“V”形轨迹变化等问题构成了主要挑战，需要卓越的战略远见和较强的应变能力才能解决。

随着壁垒的瓦解和贸易的扩张，需要采取新方法解决全球化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



1993, 意大利

粮农组织关于“全球植物
检疫协调程序”的会议。
©粮农组织

1992

首届国际营养大会由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在罗马共同举办，来自159个国家和欧洲共同体的130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世界营养宣言和行动计划》，呼吁消除营养不良（特别是儿童、妇女和老年人的营养不良）、微量营养素缺乏症、卫生设施不足、卫生条件差和用水不安全等问题。

1994

粮农组织建立了跨境动植物病虫害紧急预防系统。目前，粮农组织的跨境动植物病虫害紧急预防系统-家畜计划继续在抗击长期存在且不断蔓延的、可能跨越国界并具有高度传染性的动物疫病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4

粮农组织发起了“粮食安全特别计划”，其目标是支持低收入缺粮国减少农业生产的同比波动幅度，并改善其公民对粮食的获取。





共持续

共持续

第三个25年

1995-2020

在粮农组织历史上，最近的这个阶段正值可持续性概念的兴起。作为一个全面的指导原则，可持续性逐渐成为人类发展和地球生物管理领域的核心理念（尽管不一定在实践上占主导地位）。这一理念包括应对粮食及农业问题的方针。

生产主义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环境、人权和全球健康领域的多个话语体系开始融合。粮农组织及其他合作伙伴为这个新出现的范式贡献了“粮食安全”这个强有力的组成部分。自世纪之交以来，这个新愿景先后因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通过而得到加强。



粮农组织的里程碑

[1995-2020]

1996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在罗马的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罗马教皇在会议上发言。万名与会者（包括来自185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共同承诺，消除饥饿并确保所有人获得可持续的粮食安全。

1997

粮农组织发起了电视粮食集资运动。举办了广播节目、音乐会和大量活动来筹集资源。比如，40美元捐款可以购买一个蜂箱，每年可生产15公斤蜂蜜；125美元可以供一个农民购买一个水泵，用于灌溉2500平方米的土地；300美元可以让60个农民购买足够的种子，种植20公顷蔬菜。在这次运动中，1000多个此类项目获得资助。

1998

通过了《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该公约在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共同协作下诞生，其宗旨是对已被原产国禁止或限制使用的农药的出口进行管控。该公约作为预警系统，有助于各国加强危险化学品在其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管理。

2013,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一名男子在自家屋顶上种植蔬菜。

©粮农组织/Marco Longari



1995, 伊拉克

一名妇女从巴格达市场的摊位购买水果，该摊位出售柠檬、葡萄和石榴。
©粮农组织/Rosetta Messori

到20世纪90年代，北美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实行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实现了粮食产量飙升，所生产的粮食规模是粮农组织成立之时无法想象的。随之出现的一些现象，如农业企业大合并、剩余产品积压成山、动物的饲养方式不断追求更高产量、单作的普遍运用、过度加工食品兴起等，都表明生产模式和供应链只是一味地让商品塞满超市手推车，却很少关注资源保护、环境关切和营养均衡。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土壤遭到侵蚀、沙漠扩大、森林退缩、野生生境减少、农业仍然缺乏资金投入、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饥饿和营养不良仍然导致上亿人健康受损。

解决方案是工业化程度较低、更加环保的农业发展模式。



1996, 意大利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意大利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的世界粮食首脑峰会上致辞。
©粮农组织/Luigi Spaventa

1996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粮农组织举办的世界粮食首脑峰会上表示，持久存在的贫富悬殊现象“对人类来说是不可承受的”。一年后，粮农组织发起了电视粮食集资运动，为农民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并资助了100多个国家的项目。

1999 粮农组织发起亲善大使计划，旨在利用杰出人物的影响力来传播关于消除饥饿的信息。诺贝尔奖得主丽塔·列维·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和足球运动员罗伯特·巴乔都参与了该计划。它标志着粮农组织正转变成为一个更加善于沟通并注重宣传的组织。

2000 通过了千年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1结合了极端贫困和饥饿方面的行动。到2015年的截止日期，极端贫困的发生率减少了一半以上，饥饿发生率则减少近一半。

2000 粮农组织通过了一项消除非洲之角饥饿的长期战略。根据重视发展议程与代表机构作用之间相互关联性的一些新兴办法，该战略旨在通过下列方式保护农村人口免受外部冲击：拓宽其谋生手段并提高其复原力；改善其环境条件、健康、教育和进入市场的途径；提升政府绩效，特别是在法治方面的绩效。



2015, 赞比亚
赞比亚社会现金转移计划的受益人领取现金。
©粮农组织/Ivan Grifi

《粮食安全罗马宣言》 (1996年) (节选)

我们重申，和平、稳定及有利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是必要的基础，可使各国能够充分重视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民主、促进和保障包括发展权在内的普遍人权和基本自由，男女全面平等参与对实现人人享有可持续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这些举措受到了一个古老智慧的启发，即贫穷和饥饿是互相依存的，必须共同解决。但是，鉴于这种认知是源于对人类更宏伟抱负的了解，新的、更为明确的政治方面的考虑介入其中。冷战结束多年后，善治的作用得到普遍颂扬。

抗击饥饿成为了更广泛讨论的一部分，并纳入了食物权和重视治理的内容。

在90年代中期至后期，随着对粮食安全的追求与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紧密联系在一起，粮农组织加大了控制有毒农药的力度。与此同时，农业与知识产权法这两大领域之间开始发生交集。2001年，经过多年的磋商，在粮农组织的协调下，《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应运而生。该条约规定，植物育种者、农民以及公共和私人研究机构应公平分享遗传材料。



2001 粮农组织经过大量的外交工作，通过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使64种作物的遗传材料得以在签署国之间免费分享。这64种作物贡献了世界上所有植物性食物消费量的五分之四。该条约旨在阻止作物多样性的丧失，包含有关保护小农和维护传统农业知识的条款。在该条约下设立的惠益共享基金至今已为上百万人提供了帮助。

2002 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计划。该计划结合了农业文化认证和技术援助，旨在统筹保护、可持续适应和社会经济发展三方面的努力（例如通过促进地方产品和农业旅游的方式）。

2004 粮农组织理事会通过了《充足食物权自愿准则》，有助于落实《世界人权宣言》中认可的一项权利。这是粮农组织第一次讨论人权的实质内容，并自此一直在与食物权相关的7个领域为各国提供支持：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法律程序、预算分析、治理、评估、监控、能力发展。近年来，许多国家将食物权纳入宪法，或可经由法庭“裁决”和强制执行。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更多的层面和责任浮现出来，当中包括：性别不平等（有证据表明粮食不安全对妇女和女孩影响更甚）；生物多样性丧失，破坏了贫困社区的食物来源；土著人民处于困境，经常被边缘化，其独特的农业知识也存在消失的风险；以及强大的机构在多大程度上能有助于消除饥饿。

将追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视为进步快速通道的发展中国家发现，粮食不安全的代价高昂。研究表明，非洲国家因粮食不安全问题导致的损失高达年生产总值的16%，因为儿童营养不良会限制受教育程度，缩短工作年限，降低生产率，并拖垮公共卫生系统。

简而言之，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国际社会一致认为，要治愈一种顽疾，就必须解决很多问题。人类发展的使命可以细分为诸多任务，但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有的操纵杆都必须同时按下。



《粮农组织2000-2015年战略框架》 共同战略部分 (节选)

- 通过利用农业、渔业、林业和畜牧业之间的潜在协同作用，增加农村穷人的机会，加强和维持他们的生计，并使之多样化（……）；
- 加强地方机构和制定政策及法律，提供更加公平获得自然、经济及社会资源的机会（……）；
- 改进公共和私营部门应对农村贫困人口多元化的不同需求的效率和成效；
- 通过自助、能力建设和赋能来促进性别敏感、参与性和可持续的战略及方针，提高农村穷人和地方、民间社会及农村人民组织的技能；



2012, 瑞典

粮农组织北欧办事处协办的联合国日活动上，一名年轻女孩展示手上的千年发展目标“纹身”。
©粮农组织/Linn Livijn Wexell

2000年，联合国通过了8项千年发展目标，为全人类制定了详细的任务表。同年，粮农组织战略框架中的措辞也基本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影响深远又细致入微，雄心勃

勃又关注细节。该框架构想了更多行动方向，也认可了更多利益相关者。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作用得到明确认可。

2006

粮农组织成立了动物卫生危机管理中心，这是一个可在动物疫病暴发后快速响应的机制，帮助各国政府应对所有可能迅速破坏供应链和农民生计的动物疫病，如禽流感、非洲猪瘟、口蹄疫、牛瘟、猪生殖和呼吸综合症（蓝耳病）和裂谷热。2011年，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共同宣布牛瘟已得到彻底根除。

2008

粮农组织举办了气候变化会议，43位国家元首和100位政府部长出席了会议。会议审议了生物燃料的兴起对粮食安全和粮食价格的影响。

2009

粮农组织大会核准了《关于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的港口国措施协定》。相较于渔业协议的一贯逻辑，即以分配捕捞配额为宗旨，该协定是首份旨在制止非法、不报告、不管制捕鱼行为并促进鱼类种群可持续性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文书。（该协定于2016年在批准后生效。）

2019,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当地儿童给农民营养学校的厨房菜园浇水。

©粮农组织/Manan Vatsyayana



粮农组织开始聚焦小农问题、社区一级的关切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对包容性和问责制方面的期望作出更积极的响应；较少关注抽象的总计数据，较多关注弱势群体。养护和可持续性开始被频繁提及，集约化和追求生产率的主导性下降。

总体而言，这些做法是富有成效的。极端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饥饿率降低了，一系列其他改善人类福祉的措施也显出成效。2015年，备受鼓舞的全球社会加快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统称《2030年议程》。该议程几乎穷尽了全世界一切问题，共制定了16个目标和一个方法性目标，对从健康到性别平等再到水下生物的社会和环境进步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规划。在这些目标下，又制定了169个具体目标，明确了行动领域，并设立200多个指标。

“零饥饿”是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最为突出的一项，粮农组织被指定为该目标若干项指标的托管机构。

在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较为突出的、仅次于最高优先级的“无贫穷”这一目标的是“零饥饿”。粮农组织为这些目标的制定提供了技术投入，并成为一系列指标的联合国指定托管机构。这些指标包括：饥饿、农业可持续性、妇女的土地所有权、水资源压力、鱼类种群可持续性和可持续森林管理。

2012 经过粮农组织牵头开展的磋商，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推动通过了《土地、渔业及森林权属负责任治理自愿准则》。该准则制定了该领域的原则和国际接受的标准，注重资源养护和保护弱势及被边缘化的群体的利益。

2013 粮农组织推出了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这是比大类别“饥饿”的衡量指标（即食物不足发生率）更细微的指标。食物不足发生率是一个预测，而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则依靠受测者自己报告的调查，来确定个体在一年的任何时间内难以获得充足、安全、有营养的食物情况。21世纪10年代末，按照该分级表的标准，全世界有高达20亿人经受着一定程度的粮食不安全。

2014 2015年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粮农组织牵头发布的年度报告，现更名为《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显示，2014年成了转折的一年，这一年的饥饿率再度开始上升，扭转了前十年的趋势，这在本出版物撰写之时仍然如此。



2012,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藜麦种植, 这是“安第斯种子”项目的部分内容。

©粮农组织/Claudio Guzmán

随着粮农组织的责任扩大, 其工具箱也随之丰富充实。为应对繁重的衡量任务, 粮农组织充分利用了其在统计和数据处理方面的精湛技术, 开发了一批应用软件用于连接小农与市场, 帮助管理牲畜, 控制破坏农作物的有害生物传播。粮农组织还利用无人机从空中评估自然灾害的风险, 制定教育计划来培训青年农民并提升农业劳动力水平, 还提供开设城市和室内农场、大棚菜园和水培果园等方面的培训。

粮农组织开始强调提升粮食价值链的重要性, 它可以使小型种植者为自己的产品找到出路并确保质量控制, 提供体面的工作, 并有助于土著社区对接小众、优质食品的需求。粮农组织还构思了物流方面的解决方案, 开展了密集的宣传活动, 以减少损失和浪费(据估计, 仅损失一项就消耗了全部种植粮食的七分之一)。总而言之, 粮农组织开始从整体上重新思考粮食体系, 呼吁对其进行改革, 以构建有助于消除贫困、饥饿、营养不良及保护脆弱生态系统的良性政策循环。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演变成悲剧性的常态。在叙利亚、南苏丹、也门和尼日利亚东北部，冲突肆虐或酝酿数年之久，夺走了上万人的生命，并使数百万人处于饥荒

的边缘。饥饿被用作战争的武器。2018年，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明确承认粮食不安全与冲突之间存在着关联，这一事实令人沮丧。



2015 在粮农组织等许多机构的技术支持下，联合国大会继千年发展目标后又通过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粮农组织被指定为多个目标下的共21个指标的托管机构，以认可其在更广泛的《2030年议程》中的职责的核心地位。

2016 粮农组织与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促进粮食安全及和平联盟成立，为联合抗击饥饿和冲突的行动带来道德权威和威望。两年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2417号决议，首次承认两者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

2019 粮农组织发布《城市粮食议程框架》。鉴于世界大部分人口现如今居住在城市的事实，农村地区已经不再是粮食专属生产地，某些情况下甚至不是主要生产地。

2019 在粮农组织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倡议下，联合国将5月20日确定为世界蜜蜂日，以引起人们对授粉媒介所面临威胁的关注。许多作物的生长都离不开授粉媒介。

随着冲突升级、有害气体堆积、生物多样性丧失，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期，已经连续10年下降的饥饿人数再次开始攀升。据《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粮农组织牵头开展的权威研究）显示，全球有近7亿人口仍然食物不足，有整整20亿人口正面临广义上的粮食不安全。距离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的截止期只有10年时间，但实现该目标的期限肯定需要延长了。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2417(2018)号决议（节选）：

回顾武装冲突和暴力与冲突引发的粮食不安全和饥荒威胁之间的联系，促请武装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尊重和保护平民，始终小心避开民用物体，包括粮食生产和分配所需物体，如农场、市场、供水系统、磨坊、食品加工和储存场所、粮食运输中心和工具，避免攻击、毁坏、挪移对于平民生存不可或缺的物体或使这些物体不再可用，如食品、作物、牲畜、农业资产、饮水装置和饮水供应及灌溉工程，并尊重和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和用于人道主义救济行动的物资。



2017, 南苏丹

在南苏丹Jonglei州Padding, 妇女们正在搬运装有粮农组织捕鱼工具包和种子的布袋, 用于分发给当地社区。

©粮农组织/Albert Gonzalez Farran



2020, 智利

在COVID-19突发卫生事件期间，智利的一家主要批发市场Lo Valledor继续向公众开放，并对其合作者和社区提供保护措施。

©粮农组织/Max Valencia

在本出版物撰写之际，COVID-19疫情除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以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这些可计算的影响外，还使人与食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脆弱。可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成为了能够检验农村

就业有多么不稳定、供应链有多脆弱、许多国家生计与穷困之间是否仅有一线之隔等情况的试金石。从粮农组织的视角来看，对疫情的一部分应对要依靠全方位的伙伴关系和系统性的创新。

2020 5月21日是首个世界茶日。茶是继水之后世界上饮用最广泛的饮料。约50个国家的1300万人受雇于该部门，其中大多数是小农。

2020 随着COVID-19疫情导致世界各地纷纷采取封城措施，粮农组织建议各国保持粮食供应链的正常运行，并保持国界对粮食贸易开放。粮农组织制定了《2019冠状病毒病应对和恢复计划》，旨在帮助世界上最脆弱人群；防止出现进一步的危机；增强抵御冲击的能力；以及加快粮食体系的重建和可持续转型。

2020 最新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根据粮食不安全体验分级表，6.9亿人正处于食物不足状态，约有7.5亿人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大多数食物不足人口位于亚洲，但非洲食物不足人数的上升速度最快。该报告呼吁，为确保可持续发展目标2仍然可实现，应对粮食体系进行大规模转型。



携手共进

携手共进

下一个25年 2020-2045

农业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是定居社会的一个可完善却又不可动摇的要素。在我们的集体想象中，农业是食物和生存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粮农组织的名称本身就认定，农业是人类经验中的一个领域，如食用土壤里长出的果实一样，理所当然且亘古不变。



2003, 肯尼亚

参加农民田间学校的渔民使用特别的渔网。这有利于肯尼亚维多利亚湖的鱼类种群可持续管理。

©粮农组织/Ami Vitale

COVID-19疫情显示出粮食供应链的脆弱，也对我们和农业历来的关系提出了考验。

然而，当我们目睹水培农场在沙漠里蓬勃发展、垂直农场兴起、植物摩天大楼在城市中破土而出时，我们可能会合理地怀疑：我们是否仍然需要土壤？在一个气候紧急情况频发、历史的必然性趋于瓦解、开拓性的生物技术研究引领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确定在人类文化中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将继续存在下

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再过一二十年，农业是否还以我们认得出的形式存在？农耕是否还是为所有人提供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

在粮农组织成立以来的75年中，其初期奉行的理念，即种植更多粮食以养活更多人口的简单方程式，即便没有完全过时，其复杂程度也大大增加了。



2018, 泰国

泰国的水培蔬菜特写：长在一小块海绵上的几种莴苣。
©AdobeStock/Kudos Studio



2014, 斯威士兰
在斯威士兰姆巴纳以南
20公里的Manzini, 一名
顾客在超市里购物。
©粮农组织/Giulio
Napolitano

世界在持续发展，以史无前例的规模发展，毫无疑问，也养活了更多人。然而，这种势头难以为继。随着粮农组织迎来75周年，离全球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最后期限只有10年，数十个国家仍然尚未取得足够进展。食物不足人数又在上升，五岁以下儿

童中有近2亿不是生长发育迟缓就是早早夭折，有30亿人无法获得最基本的健康饮食，人数之多令人震惊。肥胖及与膳食相关的非传染性疾病在成人和儿童中蔓延。根据专家建议，食用大量过度加工的食品可能持久地改变了我们肠道中的无数微生物群。

COVID-19疫情导致的封锁措施无疑使我们认识到，运转良好的食物供应链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着持久的核心地位。这场危机也揭示了世界对农业和屠宰业工人的依赖，而这些工人往往是遭受剥削与不公平待遇的移徙工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从广义上来说，农业依然至关重要。

然而，在其他方面，当然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城市消费者来说，基于土地的农业与食物之间的关系变得不那么明显。在富裕国家，农业部门的产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农业利用面积正在下降，对财富创造的贡献也十分有限。无论是在贫穷国家还是富裕国家，农业在经济活动中所占比例已经降低。在过去几十年里，农业食品经济的重心已从土地所有权（数千年来一直处核心地位）转移到投入所有权，继而是提供服务和加工能力，最后转移到了零售部门。

长期以来，农业也一直提供非食物产品，比如用来建造房屋的木材、用来制作衣服的棉花等，如今这一过程正在加速发展。农业——这个在其历史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生产必需但又低附加值商品（却仍无法让许多人填饱肚子）的行业，目前已在包括先进疗法、工程和运输等一系列第三产业中得到广泛应用。全世界的土壤仍然具

有巨大的有益潜力，但生存其中的细菌更有可能激发医药领域的突破，而非用于促进新一代水平管理的作物生长。相反地，非农业、非陆地生物量产品（如昆虫或藻类）的营养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开发和大规模利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可能不再是人们所畅想的人类延续的支点，而是很快将被视为生物经济领域的一个分支。



生物经济的应用正在城市数字背景下重新定义农业的意义。



2016, 白俄罗斯

蔬菜种植者从白俄罗斯明斯克蔬菜工厂的两块蔬菜种植圃之间穿过。
© Sergei Gaponi/NOOR为粮农组织拍摄



2018, 法国

无人机从葡萄园上空飞过。
©AdobeStock/Jean-Bernard Nadeau

回顾粮农组织迄今为止所使用的所有方法，诸如国家驱动的生产主义、以发展为主导的计划设计、以小农为中心的可持续性倡议等，都体现了对粮食与农业之间密切联系的悠久认识。所有这些方法都仍将在粮农组织的运作历史及政策组合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为我们这个时代设计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天都有新发现，创新层出不穷，经常要进行全面彻底的重新规划。所有的传统办法，不管多么有用，都不足以使世界走上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永不后退的道路。

粮农组织在新的管理层领导下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当前的形势是开放、不断变化、多方向的。粮食可能不会与农业完全脱钩，但发展出了较短的联系，两者的关系不再是彼此独占，而是更加趋于非对称。粮农组织未来几乎肯定会致力于不同的议题。



2020, 肯尼亚

在肯尼亚，一名粮农组织专家在手机上的eLocust3应用程序中输入坐标，追踪蝗虫幼螨带。

©粮农组织/Luis Tato



粮农组织已经在积极开发面向农民的应用软件和金融产品，包括在植物病害诊断、逆境分析和农作物保险方面，并计划利用大数据来实现粮食安全目标。比如，利用远程传感器监控生物质水生产率；建立收获后系统管理交互平台；通过区块链提供农业保险，并将智能合约与卫星生成的天气数据及手机钱包相连。所有这些项目都在研究阶段或已进入实施初期。

由于科学成果和创新几乎可以即刻为广大用户获取，粮农组织不应再固守第三方知识传播者的传统角色，必须转变为实时知识的共同创造者。要实现这个角色转换，就只能通过与生成大量知识的机构（即学术机构和私营部门）开展深入、主动的协作。

与此同时，在国家层面，各国政府正采取促进创新的框架。比如，在2019年中，至少有49个国家制定了生物经济战略。在此后一年中，欧盟推出了“从农场到餐桌”的战略，制定了建立公平、健全、环境友好的区域粮食体系的目标。面对这些不断涌现的政策措施，粮农组织有责任通过提供分析方面的投入、应用知识和监管系统，来加强有利的实施环境。例如，2019年，各成员国要求粮农组织设计一个可以统一粮食生产数据化方面各项政策和标准的机制。这些要求中的大部分都与技术有关，有些将涉及治理，包括数据保护、降低偏见的风险、解决数据鸿沟问题等。

在非洲难民营，粮农组织的姊妹机构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利用聊天机器人来评估粮食和营养需求。鉴于人工智能在涉及粮食安全、营养和健康应用软件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粮农组织已与梵蒂冈和全球科技巨头合作，共同签订了《罗马人工智能伦理宣言》，该宣言融合了道德愿景、科学远见和监管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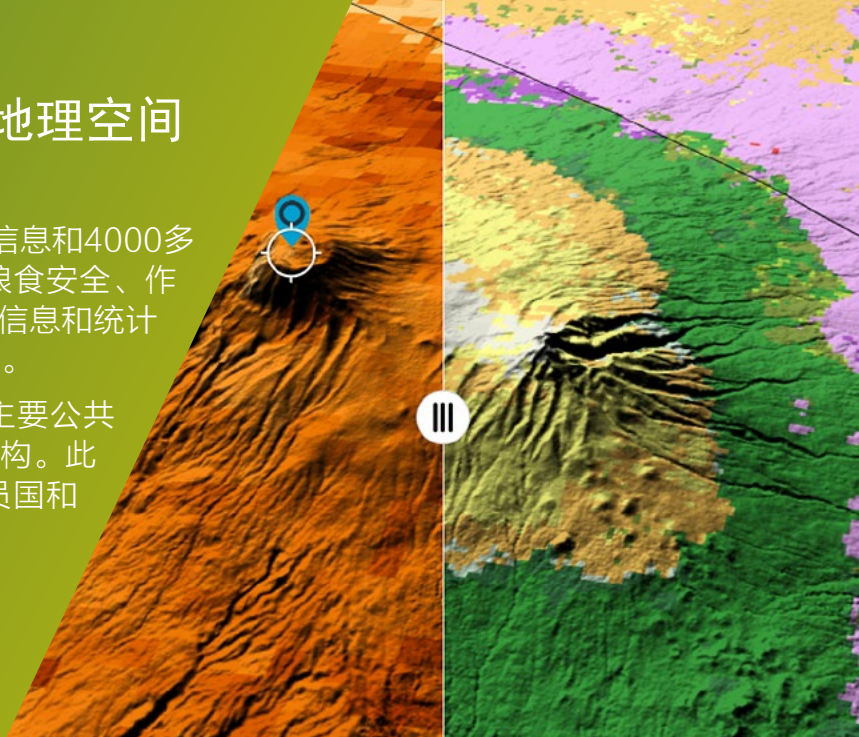
《罗马人工智能伦理宣言》 原则部分

1. 透明：原则上，人工智能系统必须是可解释的；
2. 包容：必须考虑到全人类的需求，以便每个人都能受益，并为所有人提供表达和发展自己的最佳条件；
3. 责任：设计和部署人工智能使用的人员必须承担责任并保持透明；
4. 公正：不以偏见创造或行事，从而维护公平和人的尊严；
5. 可靠：人工智能系统必须能够可靠地工作；
6. 安全和隐私：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安全运行并尊重用户的隐私。

2020年7月启动的“手拉手”行动计划地理空间信息平台

“手拉手”平台有100万个地理空间分层、数千条统计信息和4000多个元数据记录，汇集了十多个粮食及农业相关领域（包括粮食安全、作物、土壤、土地、水、气候、渔业、畜牧业和林业）的地理信息和统计数据。还包括有关COVID-19疫情对粮食及农业影响的信息。

平台数据来源于粮农组织以及整个联合国系统的其他主要公共数据提供机构、非政府组织、科研院所、私营部门和空间机构。此外，平台还集成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中194个成员国和51个地区从1961年到最近数据可得年份的粮食和农业数据。



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大量的行动联盟，旨在获得改善人类社会的结果。

直到最近，这种在一个主要联合国机构、世界信仰权威和硅谷之间的合作还看似不大可能发生。然而，不断演变的社会参与和全球治理模式都揭示广泛重叠和累积影响的可能性，《罗马宣言》的签署国就通过呼吁“算法伦理学”影响了数十亿人的生活。大体而言，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大量的行动联盟，围绕横跨众多领域的挑战，汇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实体和大量追随者，这是一种由数字化支

撑的团结，旨在获得改善人类社会的结果。在这类协作运动中，较有针对性的一种联合措施是粮农组织的“手拉手”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旨在将富裕程度各不相同的国家实现结对帮扶，即捐助国与受援国共同合作，实现既定的粮食安全目标。“手拉手”平台配备了丰富的数字资源，作为一项公共产品，这些数字资源必定会通过众多如毛细血管般的双边伙伴关系的增长来积累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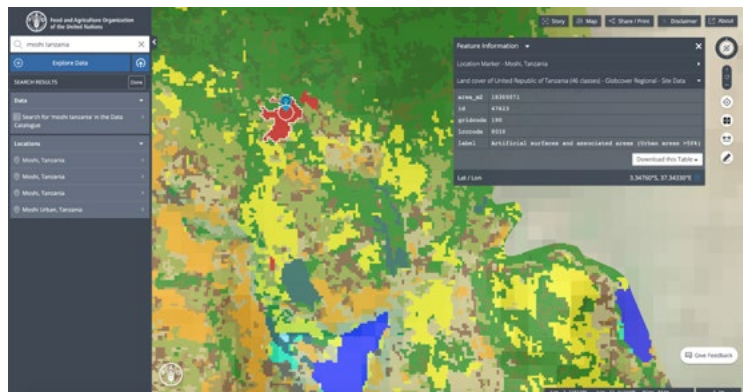
2020, 坦桑尼亚

粮农组织“手拉手”地理空间平台展示坦桑尼亚莫西Rombo区的土地覆盖(上)。

©粮农组织

地理空间信息补充了地面所采集的信息,并通过后者验证。2012年,图中所示区域的监测和数据采集由护林员完成(下)。

©粮农组织/Simon Maina



诸如灌溉计划之类的基于模拟数据的实体项目以及传统的能力建设或赋能计划都不会在未来终止。然而,粮农组织在下一阶段的发展过程中,将转变技术援助和宣传的方式,力求提供系统性的支持,利用最新科研成果和大数据,结合全球宏观指标,推动实现社会转型。

粮农组织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涵盖粮食安全所有方面(包括气候和环境维度在内)的科学政策平台。为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粮农组织于2020年年中设立了首席科学家的职位。同期,还发布了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在各国粮食供应链采取的特定干预措施,不仅将大幅降低健康膳食的成本,使其变得更可负担,从而改善数十亿人的营养状况,还可能每年节约五分之四与膳食有关的健康和气候成本(共3万亿美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这两项成本到2030年将使全球各国的预算不堪重负。





粮农组织的技术援助将利用大数据，向着粮食体系转型的目标努力。

2030年仍然是消除一切形式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的最后期限。在与时间赛跑、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局势转变，农业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应用软件取代传统农具。食物本身也发生了改变，我们对食物在生物和文化层面的理解亦是如此。最终，我们如何养活世界不再那么重要，而通过安全、有尊严的方式快速而持久地实现了养活世界这一目标则变得更为重要，并且其重要性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突显。

2017, 孟加拉国

在孟加拉国，儿童使用平板电脑作为学习设备。

©粮农组织/Mohammad Rakibul Hasan

历任 总干事



屈冬玉
2019-

中国人（1963）。屈冬玉博士出身于稻农家庭，是国际知名农业专家、科学家。他致力于在全世界消除饥饿和极端贫困。屈博士专业背景深厚、履历丰富，曾担任科研院所领导，长期参与国际交流合作，并在大型企业集团担任高层管理职务。他曾任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农业农村部副部长，积极推动政策制定与创新，利用数字技术促进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转型。

在屈总干事领导下，粮农组织正朝着更具活力、创新、高效和包容的方向前行，推动建设更美好的世界。



若泽·格拉济阿诺·
达席尔瓦
2012-2019

巴西人（1949）。圣保罗大学农艺学专业毕业。成为粮农组织总干事前，曾任巴西粮食安全和战胜饥饿特别部长，期间领导了巴西“零饥饿”计划。



雅克·迪乌夫
1994-2011

塞内加尔人（1938-2019）。曾任议员、西非国家中央银行秘书长、驻联合国大使。历任粮农组织总干事中任期最长。



爱德华·萨乌马

1975–1993

黎巴嫩人（1926–2012）。任粮农组织水土发展司司长至1975年。任总干事期间设立技术合作计划提供紧急援助。



阿德克·亨德里克·布尔马

1967–1975

荷兰人（1912–1992）。1945年任荷兰粮食局长，1962年任世界粮食计划署第一任执行干事，直至担任粮农总干事。



比奈·兰詹·森

1956–1967

印度人（1898–1993）。曾任农业部长、大使。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第一位总干事，1960年发起“免于饥饿”运动。



菲利普·V·卡敦

1954–1956

美国人（1889–1965）。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农业经济硕士毕业。加入粮农组织前在美国农业部任局长职务。



诺里斯·E·多德

1948–1953

美国人（1897–1968）。任总干事之前在国内很多农业机构或协会担任职务。在他的领导下，粮农组织从华盛顿特区迁往罗马。



约翰·博伊德·奥尔

1945–1948

苏格兰人（1880–1971）。他关于“世界粮食局”的建议推动粮农组织理事会于1946年成立。1949年因营养研究获诺贝尔和平奖。

部分 参考文献

粮农组织参考文献

FAO. 1950a.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p638e/ap638e.pdf>).

FAO. 1950b. *Program for the 1950 World Census of Agriculture*.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bq471e.pdf>).

FAO. 2015. *70 years of FAO (1945–2015)*.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i5142e/i5142E.pdf>).

FAO. 2017a. *Basic texts of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mp046e.pdf>).

FAO. 2017b. *FAO and the SDGs. Indicators: Measuring up to the 2030 Agenda*.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6919e.pdf>).

FAO. 2017c. *The futur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Trends and challenges*.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a-i6881e.pdf>).

FAO. 2019a. *The Stat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9. Moving forward on food loss and waste reduction*. Rome. <https://doi.org/10.4060/CA6030EN>

FAO. 2019b. *Transforming the world through food and agriculture: FAO and the 2030 Agenda*. Rome.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fao.org/3/ca5299en/ca5299en.pdf>).

FAO, IFAD, UNICEF, WFP & WHO. 2020. *The State of Food 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 2020. Transforming food systems for affordable healthy diets*. Rome, FAO. <https://doi.org/10.4060/ca9692en>

其他参考文献

Carson, R. 1962. *Silent spring*.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ribb, J. 2019. *Food or war*.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zoyer, M. & Roudart, L. 1997. *Histoire des agricultures du monde*. Paris, France, Éditions du Seuil.

Ó Gráda, C. 2009. *Famine: A short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haw, D. 2007. *World food security: A history since 1945*.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Tauger, M. B. 2013. *Agriculture in world history*. London, UK, Routledge.

Viaggi, D. 2018. *The bioeconomy: Delivering sustainable green growth*. Wallingford, UK, CABI.

75





联合国
粮食及
农业组织

FAO 75

齐成长、
同繁荣、
共持续。

#FA075

75年来，粮农组织的名字、志向和精神不曾改变，而其他一切都已改变，并将进一步改变。

1945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在战后重建的理想主义中建立了，它在建立之时力求增加世界各地的农业产量，使饥荒成为历史。在随后的75年里，粮农组织的观念和工作内容中加入了新的维度，即环境和可持续性。到2020年，要获得持续的成功，我们需要做出战略调整。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加剧了与冲突和气候变化有关的脆弱性，粮农组织期待通过进一步深化研究伙伴关系、数字化和全面创新，帮助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

距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还有十年的时间，我们正在征途上努力前行，寻找勇敢的答案和振奋人心的解决方案。

75

ISBN 978-92-5-133419-5



9 789251 334195

CB1182ZH/1/10.20